DOI:10.16007/j.cnki.issn2095-7114.2013.02.004

从二陆之死看西晋南北方文化的冲突

翁 频

(闽南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系,福建 漳州 362000)

〔摘 要〕魏晋时期中国南方与北方的士人在文化心理、学术传统、政治思想、生活态度上有着很大的差异与冲突。这种差异与冲突在孙吴被灭、西晋政权统一全国之后仍然存在。太康年间孙吴旧地士人形成一股入洛求仕的高潮,正是由于这种差异与冲突,南方士人的求仕干进之路不断受挫,其代表人物陆机、陆云,最终被害身亡。

〔关键词〕陆机;陆云;文化;冲突

中图分类号:K2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8X(2013)-02-112-07

陆机,字士衡,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西晋文学家、书法家。与其弟陆云被人们并称为"二陆"。其家族为吴郡四姓之一,与孙吴政权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晋统一全国之后,吴地士人群体经过十年左右的沉淀,在太康年间形成了一股入洛求仕的高潮。据《三国志》、《晋书》所载吴亡之后入洛之孙吴旧地士人有二十五人。二陆、顾荣即为这批入洛求仕的孙吴旧姓的代表人物。但这些南方士人在洛阳求仕之路并不通达,而是不断地遭到挫折。太安二年(303),八王之乱中成都王司马颖举兵讨伐长沙王司马乂,以陆机都督统兵。兵败,陆机遭人陷害被杀,夷三族。

二陆之死作为西晋政坛、文坛的一个重要事件,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周一良就曾说过:"综观陆士衡一生出处及其致祸之由,似不能不联系其出身吴人考察之也。"[1](74)王永平详细考证了二陆之死的原因,将二陆之死放入成都王幕府中的士君子与奸佞的斗争中考察,认为陆氏兄弟作为成都王府中的正直人士之代表,因不满成都王颖的蜕化以及宠嬖孟玖的作为而与之产生了激烈的矛盾与冲突,最后奸佞小人借军败之机,对其大肆诬陷,终于导致二陆被残杀。①

但为何二陆因其南人之故,就备受排挤,在家族强盛的魏晋社会中,二陆仅是因为代表了一个大地域——南方,而就成为众矢之的吗,还是其背后另有原因?这需要我们从更为开阔的视野去看待这件事。

一、西晋南北方士人的差异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南北两地及其士人间至少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差别:

(一)北人优越的心理

中原地区是中国历史上开发早最的地方之一,被称为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在原始社会晚期,中原文化便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作为中原文化的轴心之地,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便是以河南为中心活动。中国的政治中心曾长期在河南,夏、商、东周、东汉、曹魏、西晋都在河南建都。政治中心往往也

〔收稿日期〕2013—05—14

〔作者简介〕翁频(1978~),女,福建省连江县人,闽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编号:11YJC770068)。

①见王永平:《陆机入洛之遭遇及其死因考析》(《东南文化》2000 年第 3 期)、《论陆机陆云兄弟之死》(《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2 年第 3 期)、《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第七章"陆机陆云兄弟之死与南北地域冲突"。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跟文化中心联系在一起，由于首都集中了众多的全国性的文化机构，又是国内外文化名人会聚的地方，其文化氛围与根基自然深厚，促进文化发展的条件也比较优越，因此许多代表国家文化的成果也常在首都及其附近产生。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在首都生活的士人有了极其优越的条件进行学习与文化创造，并由此产生强烈的自豪感。特别是在讲究阶级等级的中古社会，他们往往以自己为高级，对外来之人总是抱着一种卑视的态度。江南虽然很早亦开始了开发，但是由于地理位置所限、自然环境所隔，在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消息往来不如中原便利，与其他文化交流较少，发展相对也较慢。因此北人总是视南人为蛮荒之地而来的，必是不能与其相抗衡。西晋灭吴之后，这种心理上的优越感愈发突显，往往强调吴人为“亡国之余”，认为他们此时在社会身份上也低北人一等。这种心态在北人身上是十分明显的，是他们与南人交往的基调。

（二）南方士人儒学学术传统与中原玄学的矛盾

三国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地区，率先兴起了玄学，排除汉代经学注重章句的烦琐，破除谶纬学说的迷信。以三玄即《周易》、《老子》、《庄子》为思想源泉，开始了探寻新的权威思想的学术活动。玄学从曹魏正始年间兴起，到南人入洛时，业已经过几个阶段。从最初的以道为本，儒为末的本体论探讨，到后来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关注个体精神超越和理想人格的塑造。此时，西晋社会刚从前两次的探讨的失败中恢复，玄风再度大畅，这时的讨论话题是如何将个体与社会、名教与自然、内在的精神超越与外在的干进求禄相结合在一起。而南方入洛的士人仍然守着旧有的家传经学，与北人的学术旨趣、政治思想、生活态度截然不同。这也是南北方士人冲突的最主要的原因。

魏晋之时江东地区的学术仍以汉代经学为主。陆绩与虞翻可谓是代表了当时江东学术的最高水平，他们均是秉承汉儒经学的。陆氏家族自汉代起便为地方文化世族。陆绩“幼敦《诗》、《书》，长玩《礼》、《易》”[2](P329)，“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该览”，虽在军旅，“著述不废，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2](P1328—1329)。《隋书·经籍志》载他著有《周易注》15 卷，与虞翻合著《周易日月变例》6 卷，《扬子太玄经注》13 卷。能与虞翻合作著书，其学术必是遵循汉代经学传统，以象数、占卜为主。其族孙陆凯“虽统军众，手不释书。好《太玄》，论演其意，以筮辄验”[2](P1400)，走的也是象数易一派。顾氏一门也是以儒术立家，其家风以仁厚为世人所称。其代表人物顾雍为人庄重，恪守礼度，为孙权所重。顾雍长子顾邵博览书传，好乐人伦。为豫章郡守之时，以典型的汉儒之敦睦教化方法治理地方。顾氏家族世代共居，俗传：“子孙多不能辨架上之衣”[3](P236)，这也是受儒家孝悌思想影响的表现。会稽虞氏、贺氏虽在家族势力上无法与吴郡四姓相比，但就文化而言却可为江东儒宗。虞氏家族世传《孟氏易》学，到虞翻已是第五代。虞翻著有《老子》、《论语》、《国语》、《太玄》训注。他的《易》注影响很大，后世称为“虞氏学”。虞翻的四子虞汜、五子虞忠均以忠直闻名。会稽贺氏，其家世传《礼》。汉末贺纯“儒学有重名，汉安帝时为侍中、江夏太守”[2](P1377)。贺齐之孙贺邵为孙皓时太子太傅，以儒家民本学说和忠义理念，上疏指陈时弊，将矛头直指孙吴末帝孙皓，而遭杀害。由此我们也可看出在魏晋玄学在北方兴起的时候，江东仍是以儒学为主。

入洛的这些南士继承其先辈之学术，亦以儒学为学术旨趣、安身立命之准则。史称陆机“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4](P1467)。陆云性清正，“爱才好士，多所贡达”[4](P1483)。何法盛《晋中兴书》有言：“时吴朝士人入洛者。唯陆机、陆云、及顾荣三人。而机、云虽有才藻。清望不及荣也。”[5](P438)是指二陆虽以才名显，但是却不如顾荣宽厚、谦抑，有长者之风。贺循“节操高厉，童龀不群，言行举动，必以礼让。好学博闻，尤善《三礼》”。[2](P1459)东晋初创之时，“宗庙始建，旧仪多阙”，“朝廷疑滞皆谘之于循，循辄依经礼而对，为当世儒宗”。[4](P1828—1830)戴邈“少好学，尤精《史》《汉》，才不逮若思，儒博过之”。[4](P1848)陶侃“恭而近礼，爱好人伦。终日敛膝危坐，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并经常告诫他人：“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认为樗蒱之戏是：“牧（左月右者）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宏达邪！”[4](P1773—1774)他的行事立命，亦是以儒家礼法为要。

在这种情况下，入洛南士虽对中原的文化有所学习与吸收，但终不能将其全盘接受，因而他们在学术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旨趣上是与北方士人大相径庭的。在北方盛行绮靡诗风、五言诗的情况下,陆云就不太擅长作五言诗。他在跟陆机的通信中自述:

"四言、五言非所长,颇能作赋。"[6](P135)

"大类不便作四言、五言。"[6](P139)

"张公箴诔自过五言诗耳。但云自不便五言诗,由己而言耳。"(同上,第二十二)[6](P43)

上面的通信的内容很明确地告诉我们陆云不擅长作诗,尤其不长作五言诗。陆云所作诗歌,今日可见均收于其文集之中,卷二有九首六十六章,卷三有十四首六十一章,卷四有八首八章,其中卷二和卷三所收全是四言诗,只有卷四的八章是五言诗。而且这八章五言诗是均是为熟人而写。在其它场合他所诗歌均为四言。而且他的四言诗多为拟《诗经》词语所作,其典型则是《赠顾骠骑》二首:《有皇》八章,《思文》八章,题目均出于《诗经》,其内容也是模仿《诗经》语句。①相比而言,四言诗较古朴典雅,五言诗灵活清新,富于韵律,更能适应当时潮流。所以当时北方文坛四言诗已衰落,五言诗方兴未艾,渐"居文词之要"[7](P49)。因此他们的这种文学取向也是跟北方大有差异的。再有顾荣与纪瞻在永嘉初再次入洛之时,顾荣至少已在北方呆了十几年,纪瞻也曾在北方呆了不少时日,但他们在途中讨论《周易》太极学说,唐长孺先生考论了他们二人虽然讨论太极的意见不同,但均未理解王弼的说法,实际上仍是守着汉儒家数。②十几年的时间,还不能让这些南方一流的人才理解与接受玄学的思想,可见南北双方学术的差异有多大。

(三)政治思想的差异

陆机所著文章中有相当部分如《辨亡论》、《五等诸侯论》、《汉高祖功臣颂》、《孔子赞》、《演连珠》、《盛德颂》等均是对政治、治国方略的探讨。另有《晋纪》、《晋惠帝百官名》、《惠帝起居注》、《吴书》等史学作品,其《晋书断限议》说道:

"三祖实终为臣,故书为臣之事,不可不如传,此实录之谓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称纪,则追王之义。"[8](P181)

以名教之君臣纲常为准,认为西晋三祖虽名同帝王,却仍不得称纪,应系之以列传之中。

纪瞻入洛之后,陆机亲自对其加以策问,在玄风盛行的情况下,其策问之六条,却无一关乎玄学。策问的六件事,其一为问三代损益,百姓变迁的原因,现在欲救时弊将如何从中吸收经验。其二问明堂、清庙、辟雍、太学的异同。由于古代典籍较少,经过汉以前的长年战乱,对于明堂、辟雍的设置从汉代起争议就颇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自汉代经学盛行之后,学者便依照他们对古代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的理解,比附阴阳五行学说将这些传说中的国家礼制的象征与执行地一一设置。陆机以此设问,重在考察纪瞻《礼》学修养。其三问古代兴国之王具备何"道"而能致多士。纪瞻认为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要学习上古明君开进士之途,尊贤揽能。这一点也是以儒家的治术为出发点的。其四问任刑宽克之度,族诛之法是否能为永世之制。纪瞻反对法家学说,认为自汉代以来用刑法乃是权宜之计,现在天下统一,就应该宽刑法,用仁义,族诛之法也应废除。其五问阴阳相须,二仪陶育,若一气偏废,则万物不得独成,"今有温泉而无寒火"是何原因。纪瞻对以《周易》及阴阳五行之说,认为是水有包容性,包含了阴阳的关系。其六问古代民风淳朴,而后世机心竞起,是大道一离理而不可振,还是圣人之道稍有降杀。纪瞻认为现在大道已经没有了,而三代损益则是因时之宜。③

由上可见孙吴士人虽入洛仕宦,但他们的政治思想仍是以儒家经学为源泉。

(四)生活态度的差异与冲突

北方玄风畅行之后,士人亦以玄学为行为准则,推尚老庄之通脱,生活态度趋向任性适意,甚至还有不少过激的行为。但是南方的士人的生活态度却严谨刻板得多。陆机伏膺儒术,非礼不动。扬州刺史周浚则曾经感叹过陆云为当今之颜渊。[9](P236—237)陶侃每日正襟端坐,勤于吏事,对于当时流行的做法十分反感,

①关于陆云所作诗歌的《诗经》意识,可参看[日]佐藤利行著,周延良译:《西晋文学研究》,第一章"西晋的文学集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②见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载《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③策问详细内容见《晋书·列传第三十八》"纪瞻传",第 1815–1819 页。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甚至禁止他的属下参与这些活动。周处“志存义烈，言必忠信克己”[4](P1570)。纪瞻“性静默，少交游”、“慎行爱士，老而弥笃”[4](P1824)。褚陶“弱不好弄，少而聪慧，清淡闲默，以坟典自娱”[4](P2381)。他们到了洛阳之后见到中原士人种种任诞怪异的举动想必是不能理解，更遑论参与他们的这些“沙龙”活动。

史志中对南方士人参与中原士人的这种活动的记载甚少，只记下二陆预与贾谧“二十四友”集团活动，但是从现有的资料上看二陆与“二十四友”中其他成员的关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融洽。至少在现今我们看到的二陆的文集中，只有一首陆机赠贾谧的诗歌《答贾谧》，他们就没有跟这个集团的人有诗酬应答。荥阳（今河南荥阳）潘岳在他代贾谧赠给陆机的诗《为贾谧作赠陆机十一章》之中就暗藏他（或他们）对陆机的不屑。其诗第四章云：“南吴伊何，僭号称王。……伪孙衔璧，奉土归疆。”[10](P228)陆机出身吴国，其家世为吴将，以亡国之余的身份入仕西晋，处处受人冷眼，这也是他们心里的伤痛，潘岳却在赠诗中毫不留情地骂孙吴为伪。裴启《语林》更有一则：“士衡在座，安仁（潘岳字）来，陆便起去。潘曰：‘清风至，尘飞扬。’陆应声答曰：‘众鸟集，凤皇翔。’”[8](P191)更明显地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两人关系确实不太友好。“二十四友”之一的齐国（今山东淄博东北）左思作《三都赋》，陆机听说之后写信给陆云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4](P2377)“伧父”一词乃是吴人骂北人之语。陆机用此词来称呼左思，可见他们之间并无多少交情。后来陆机在成都王颖府中任事，甚见委仗，“二十四友”之一的王粹与其同在军中，陆机被人诬害致死，他也没有出面证明陆机清白。

张华是对南人相当友善的北人之一。但在他的府中进行的集会，南人似乎也没能占上风。

“隐与陆云在张华坐语，互相反覆，陆连受屈。隐辞皆美丽，张公称善。”[9](P424)

荀隐，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其家族也为世家大族。他与陆云都在张华家碰面，张华引他们相见清谈。于是两人开始交锋，但是从事后的记载我们也可看出陆云没有在这次谈论之中胜过荀隐，而是连连受屈。可见以陆云的才学、文名还连连受屈，谈论的必为陆云不甚熟悉之话题。南人对这类清谈还是比较陌生，不易在这类活动中取得优势。

正是由于南人在学术、政治思想、生活态度上与中原士人差异很大，所以南人在中原很难找到他们想要的认同感，反倒处处受到排斥。南人自小在南方以汉代经学为主要思想源泉的环境中成长，这些在南方有着很高的声望的士人，自然是深深认同自己地方社会的一整套文化与价值观念。但是也正是因为对自己的区域社会文化有着高度一致的认同，他们对中原社会的以玄学为准的文化及行为方式有着强烈的不适与抵触。二陆入洛之后，他们的思乡之情屡屡在诗文中流露，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即是他们对北方社会的不适应。也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开始了南北方士人更进一步的冲突。

二、二陆之死

从东汉起世家大族便在中央政权与地方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余英时先生在《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一文中指出光武帝不重单身之士，依仗的是有宗亲势力之人。东汉的灭亡也是因为其与士大夫阶层矛盾激化而导致。①接下来的军阀割据与三国鼎立，豪族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西晋王朝的建立也是与一些原本受曹魏压抑的豪族的支持有关。孙吴世家大族不但势力强大，而且家族间盘根错节，互为婚姻，在经济与政治利益上更是一个联系紧密的集团，这些世家大族是连成一体的带有浓厚血缘关系的姻亲集团。他们与孙氏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孙吴亡国他们遭受打击颇大。太康年间形成南人入洛的高潮，可能也与他们之间达成的一致有关系。

入洛这廖廖十数人，人数虽少，却是孙吴旧地的精英之士，他们在生活方式、思想文化上本有天然的相似性，在政治上必也见解一致，从而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势力。他们入洛之初，便引起了中原士人，特别是朝廷高层人士的重视。二陆入洛，他们先后接触了前太常、广武县侯张华，太尉杨峻，黄门侍郎贾谧。可见他们入洛之初，各路政治势力都对他们伸出过友谊之手，意欲吸纳他们，借以壮大自己的势力。

①文载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但是正是由于他们所持的政治态度,与经历过高平陵之变,嵇康之死等政治事变的中朝名士大相径庭。此时距高平陵之变(曹魏正始十年,249)司马懿屠杀曹爽一党,不过四十余年;距嵇康被司马昭杀死(曹魏景元三年,262),更是不过二十余年。在朝士人多半或是亲身经历过这些事件,或是这些事件亲历者的下一代,可以说先辈或同辈的血迹还历历在目,他们对司马氏的屠刀心有余悸。正是在天威迭更的闹剧里,死亡恐惧压迫下的他们早已没有前代士人的热血与正义感,奉行的则是"身与名俱泰"的原则,生命意识空前觉醒,还有什么比生命更为可贵,比享乐更为惬意! 他们散发袒身、饮酒作乐、清谈游宴,参与各式游戏,生活丰富多彩,任诞之风渐长。这些行为用儒家的观点来衡量就是颓废放任,浪费生命,破坏纲纪。因此北上的孙吴士人无法理解这类行为,也无法融入他们的话语圈子当中。在政治上,他们从最初的试探与接触,走向了分歧。陆机与贾谧的交恶就是一例。

陆机在赵王伦被杀后,因参与了禅让诏书的起草而被捕入狱。而在此时陆机曾经供事过的吴王晏和未曾与他打过交道的成都王颖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使他免于死罪。此时成都王颖在他的幕僚卢志等人的建议下,他不与他人争功,还四处抚生送死,深得朝野之望。于是陆机将复兴国家、实现个人价值的理想寄托在颖身上,投奔了他。他甫一入幕,便深为颖所依仗,以他为大将军参军、平原内史。他的弟弟陆云、陆耽、南人孙惠、孙拯也相继被他推荐入幕,在他身边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南人集团。这是他入洛之后,第一次在仕途上有了不错的起色,他也踌躇满志地想做一番大事业。但是他却忽略了成都王原来的幕属,他们不能容忍陆机的异军突起,抢占他们的功劳。当颖与河间王颙起兵攻打在洛阳的长沙王乂之时,陆机又被任为河北大都督,督管北中郎将王粹、冠军将军牵秀等诸军二十余万人。这次战役是至关重要的一战,若能得胜,就能在将来的中央政权中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故颖也在大军出发前对陆机许以高位。而原本对陆机的受宠就十分不满的那批人,就更不能容忍陆机取得这场胜利。于是他们开始联合起来诋毁陆机,甚至最后合伙谋杀了他。这些人主要是范阳卢志、孟玖、牵秀等。

卢志,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州)人,字子道。其家族是河北一流高门士族,世以儒业显。他少时便有名气。他与"二十四友"之中的中山刘琨为姻亲,并且相交甚深。北地士族虽本身以儒学立命,但刘琨入洛后不但参与了"二十四友"集团的活动,还是石崇金谷集会的活跃分子,与石崇相交亦深。刘琨曾在给卢志之子卢谌的信中自述年轻时"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从而生,哀乐何由而至"。[11](P8082)可见他已是深受玄风薰染的一代人。卢志之长子卢谌则是好《老》、《庄》,并注过《庄子》,可见卢志也对玄学有所涉及。

成都王颖镇邺后,爱他的才量,便委以心臂,成为其谋主。史称颖"形美而神昏,不知书,然器性敦厚,委事于志,故得成其美焉"[4](P1617)。齐王冏兴兵讨伐赵王伦之时,颖用他的计策打败其军队。平定赵王伦之后,他又建议颖以太妃疾病为由还邺,不与齐王争功。并建议其兴义举掩埋了在战争中死亡的战士。这些举动使颖获得了全国上下的称赞,士众皆归心于他。太安元年,河间王颙欲联合成都王,与长沙王乂内外合应,除齐王冏,立颖为储副。卢志力谏,不从。灭了齐王之后,成都王也走上了赵王伦的老路,心怀不轨。他在讨平张昌之乱后,直接兴兵攻打在洛阳的长沙王乂,卢志再次劝阻他,但颖却不吸纳他的意见,以陆机为前锋都督、前将军、假节,领二十万军队攻打洛阳。

二陆与卢志的过节,《世说新语》有着一则生动的记载:

> "卢志于从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君于卢毓、卢珽。"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耳!"[9](P167—168)

当时人极重避讳,地方长官到任,下级官吏尚要先行问讳,更何况在谱牒之学兴盛的高门士族之间。因此卢志当众直呼二陆父祖之名,是故意侮辱的行为,陆机反应强烈,予以反击。二人相互以先人名讳对骂,这在当时是极其不尊重对方的行为,由此二人结下仇怨。依卢志在大庭广众中对陆机发难的事情来看他也不是一个胸襟广大之人,而陆机对卢志反唇相讥,也表明了他也是性格直耿,不愿示弱于人。因此陆机到成都王府中也不可能与他交好。卢志的建议在陆机到邺都之后明显地没有以前有效力了。此时颖却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对陆机大加依仗，委以重职。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卢志心怀不平之意确有其事。更有陆云受牵连，其属下为宥其一命请命，而功败垂成，也是因为他的一席话。卢志虽然陷害了陆机，但他本人却对颖始终不离不弃，得到了世人的称赞。

成都王的另一个近身侍从宦官孟玖，也与二陆有过节。他想为自己的父亲求邯郸（今河北邯郸）令一职，卢志等人知道成都王十分宠爱他，都同意了，而陆云却固执不许，认为："此县皆公府掾资，岂有黄门父居之邪！"[4](P1484)孟玖是个宦官，内心必有自卑之感，而陆云却如此称呼他，因此对他深为怨恨。他的弟弟孟超也深为成都王所宠。此役中，他带领了万人为小都督。还未战便派兵大肆抢掠。陆机追究此事，抓拿主犯，他率了百余铁骑，直接闯入陆机营中夺人。还公开辱骂陆机："貉奴能作督不！"[4](P1479)陆机没有将他问罪。孟超却四处散布谣言，称陆机将反，还写信给他哥哥孟玖说陆机暗通长沙王乂。开战之后，他不受陆机节度，欲争功轻进，被杀。孟玖怀疑是陆机杀了自己的弟弟，于是在颖面前诬陷陆机私通长沙王。并与将军王阐、郝昌、公师藩、牵秀等人一起相互证明。成都王就相信了他们的话，派牵秀将陆机关押起来。

安平（今河北武邑东南）牵秀是"二十四友"成员之一，按理说来他与陆机同为张华所提携，又在贾谧府中有过共宴之欢，应与陆机相亲近。但他却谄事孟玖，将陆机最后推向了死亡。他的思想旨趣也是以玄学为主。他的《相风赋》以《庄子·齐物论》第一节以风为喻的典故写作。另有《老子颂》、《彭祖颂》、《王乔赤松颂》均为慕玄尚仙之作。他也是因为谄事孟玖而被成都王颖所亲善。

弘农（今河南灵宝西北）王粹，也是"二十四友"成员之一，他是一个贵公子，深受玄风影响，在京师广兴馆宇，还在室中画上庄子之像，以示崇慕。他虽非河北之人，但他母亲是曹魏燕国蓟（今北京西南）人徐邈之女。当时品评人物，徐邈尤在同州卢毓之前。徐邈与卢氏交情甚佳，卢毓之子卢钦还著文称颂过他。而卢志是卢钦侄子，与王粹可谓故人。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些人陷害陆机兄弟的活动，但是他当时为北中郎将，亦同在军中，他也没有站出来为陆机清洗不白之冤，而是默许了卢志、孟玖的做法。他与陆机交情不佳，情有可缘，他的父亲王濬是灭吴的头号功臣，陆晏、陆景均是败在他的手下。虽二者分别是为两国臣子，诛杀对方是为国家大计，但对陆氏而言丧亲之痛却是一直隐在心中的。陆云在给陆机的信中也曾说过：

> "王弘远去，当祖道，似当复作诗。构作此一篇，至积思，复欲不如前仓卒时，不知为可存录不？诸诗未出，别写送。弘远诗极佳。中静作亦佳。张魏郡作急就诗，公甚笑燕。王亦似不复祖道，弘远已作为存耳。"[6](P144)

从行文的语气也可看出，他与王粹私交不深，写诗送别，只是因为听说成都王要公开设宴祖道，不得不预先有所准备。

成都王颖所镇之地邺（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东）也在河北。孟玖之父欲为邯郸（邯郸距邺只有 40 公里）令，其家必在周围，是附近一般百姓家中小孩卖与官家为宦人。可见上述诸人多出生于河北，在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地域集团——河北集团。这一集团形成的时间较早，以卢志为智囊，孟玖为核心，该集团成员辅佐成都王取得了一系列事功。但这一集团带有明显的保守性，不是很愿意直接参与中央的政治斗争。当成都王取得全国性声誉，权力欲望被激起之时，必会招兵买马，集合与他同有此想法的各方势力。河北集团既有的地位与利益就受到新进势力的冲击，这种境遇与结果是他们不能接受的。攻打长沙王乂一役对于颖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同样他幕下的这两个集团也深知此役对于自身发展的重要性，陆机为首的南人集团一心希望事成，而北人集团的成员却费尽心思要破坏他们成功。卢志从军队一出发便进谗言，欲为成功之后破坏颖对陆机的好感打下伏笔。鲁莽之将孟超，坚决不肯受陆机节度，公开挑衅陆机的领导权，以至于轻进丧生，大乱军队阵脚。牵秀、王粹等人所率军队均不听陆机指挥，致使号称有众二十万人的军队一役而败，死伤八千余人。要由谁来承当这次失败的责任？毫无疑问，要由河北集团的这些武将们。但是留在后方的河北集团的卢志与孟玖自然要与在外的将领们一起将责任推卸给南人集团，联手制造了这起惨祸。

林校生在《八王幕府合说》一文中曾指出在八王之乱后期，大多数南士之秀既怀忧惧之心，又欲拨乱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世,立事功,在帝室飘摇的中原地区有所作为。诸王由于政治、斗争迅速热化的需要,也开始比较大量地辟引他们入幕登仕。南士长期处在孙吴政权统治之下,其婚宦与北方大族没有复杂的牵连,诸王使用时较少顾忌,遂得从容辗转权门。[12](P159)而恰恰也正因为此,南人在北人势力盘错的中原政坛之中,欲立事功也是无所依托,正如陆云在给叔父陆典的信中所写:

> “愚以东国之士,进无所立,退无所守,明裂眦苦,皆未如意。云之鄙姿,志归丘垄,筚门闺窬之人,敢睎天望之冀?至于诏季礼之遐踪,结鬲肝于中夏,光东州之幽昧,流荣勋于朝野,所谓窥管以瞻天,缘木而求鱼也。”[6](P171)

想要在中原建立功业真是窥管瞻天,缘木求鱼之举!二陆在成都王府虽然深受成都王颖的依仗,迅速崛起,但这却侵犯了原本势力强大的河北集团士人的利益,结果身首异处,家门几遭灭顶之祸。这也证明了南人欲上北方求仕,一匡世难,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

从太康末至太安二年,短短的十多年时间,孙吴地区的士人掀起了一次入洛求仕的高潮,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这些士人多选择了回归南方,可以说从他们的政治愿望来看,这次南方士人的北上并没有成功,他们中最优秀的几个人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这次北上在文化交流上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它是南方士人第一次集体登上中央的政治舞台,使北方的士人第一次面对生活环境、学术背景与中原完全不同的南方的精英,他们的思想与行动在北方社会激起了层层涟漪。对于南方士人而言,北方的政治制度、风物、时风、学术也一样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振憾。南北方士人都借此机会,开始反思与吸收双方思想的合理成份。

参考文献:

[1]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
[3]范成大.吴郡志[M].陆振岳,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4]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汤球辑.九家旧晋书辑本[M]//丛书集成初编(第 3810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6]陆云.陆云集[M].黄葵,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7]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8]陆机.陆机集[M].金涛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9]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0]董志广.潘岳集校注(修订版)[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11]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2]林校生.西晋八王幕府合说[C]//郑家馨,祝总斌.北大史学(第 5 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责任编辑 郑 镛〕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